

CHUANBEISUQU

川北苏区

秦一高 秦廷光◎编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川北猿区

秦一高 秦廷光 编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川北苏区 / 秦一高, 秦廷光编著. --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647-1297-6

I. ①川... II. ①秦... ②秦... III. ①农村革命根据地—史料—四川省 IV. ①K269.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6441 号

川 北 苏 区

秦一高 秦廷光 编著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 159 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 610051)

策划编辑: 徐守仁

责任编辑: 周 岚

主 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mm×210mm 印张 6.75 字数 169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7-1297-6

定 价: 20.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 本社发行部电话: 028-83202463; 本社邮购电话: 028-83201495。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前言

川北苏区，红四方面军的老人们习惯称“通（江）南（江）巴（中）苏区”。一些“回忆录”、“传”、“史”包括历史性文件在内的纯史料，又通常称其为“川陕苏区”或“川陕革命根据地”。事实上，它只是川北和川东革命根据地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以通南巴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统称。

本书所说的“川北苏区”，是通过遍查资料，特别是深入调查，并以大量历史文献和事实证明：脱离鄂豫皖苏区进入川北发展的红四方面军，从来就没有在陕西境内，甚至在四川边沿的陕南，由张国焘领导建立过苏维埃政权（与杨虎城的孙蔚如部达成的互不侵犯协定，也不允许这样做）。“川陕苏区”或“川陕根据地”之说，只是历史性文件中没有实现的一种战略蓝图或政治需要；而在川北的一些老人们的习称中，也只是川北苏区或通南巴苏区的代名词。在所有涉及“川陕苏区”的著作或民间传说中，“有血有肉”的“川陕苏区”，均指川北或川东革命根据地中 23 个县。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县曾划归 1950 年 1 月设置并受中共四川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的省级行政区“川北区”。这与创建川北苏区的主要历史人物张国焘著《张国焘回忆录》中绝口不称“川陕苏区”或“川陕革命根据地”，而在全书中通称“川北苏区”，形成了令人信服的互证，还原了历史真实。

目 录

第一章 概 况	1
一、川北苏区概貌	1
二、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川北社会情况	3
(一) 土地关系与剥削	3
(二) 军阀割据形势与军阀、官僚、地主对人民的压迫	7
(三) 农业生产衰退, 民不聊生与人民的反抗斗争	8
第二章 川北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发展	18
一、中共川北地下党在川北苏区建设中的作用	18
(一) 发动游击战争, 建立游击区域, 配合红军进行军事斗争	19
(二) 配合苏区打破敌人经济、政治封锁	24
二、红四方面军入川及川北苏区的建立与扩大	29
(一) 红军入川粉碎敌人第一次围攻	29
(二) 中共川陕省委第一次党代会及川陕省第一次苏维埃 代表大会	31
(三) 红军粉碎敌人第二次围攻	32
(四) 中共川陕省委第二次党代会	36
(五) 木门军事会议及其意义	36
(六) 苏区的统战工作及其意义	38
(七) 川陕省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41
(八) 红军的扩大与农村军事化	42
三、苏区的建设与发展	49
(一) 各种群众组织	49
(二) 土地革命	53
(三) 苏区的经济建设及其成就	59
(四) 工农银行与税收	67
(五) 文教卫生事业	70
(六) 拥军优属	81

四、三大战役与反六路围攻.....	84
(一) 三大战役的胜利及其战略意义.....	84
(二) 中共川陕省委第三次党代会	94
(三) 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与失误	95
第三章 苏区的“镇反”和“肃反”.....	106
第四章 红四方面军撤离川北苏区.....	116
一、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的战略行动.....	116
(一) 毛裕镇党政工作会议和清江渡军事会议.....	117
(二) 陕南战役——一次实现了部分预定目标的战斗	120
(三) 嘉陵江战役——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最后一战.....	122
二、红四方面军撤离川北革命根据地的原因.....	129
三、反动势力的复辟与疯狂报复.....	135
四、生产遭受严重破坏, 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142
五、百折不屈的苏区人民.....	143
(一) 刘子才独立师和赵明恩游击营.....	143
(二) 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人民顽强斗争.....	150
(三) 苏区人民对党和红军的思念与盼望.....	152
第五章 川北新生	155
一、川北人民获解放.....	155
(一) 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内军事态势.....	155
(二) 通南巴重获解放	162
(三) 乘胜解放南部	163
(四) 古城阆中和平解放	164
(五) 南充人民喜获新生	167
(六) 三台大捷	168
二、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经济与文化建设.....	174
(一) 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174
(二) 川北苏区的经济与文化建设	195
附 录	204
参考文献	207
后 记	209

第一章 概 况

一、川北苏区概貌

《四川省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报告（民建[53]字第一四四一号）》是根据有关县报送材料，并依照原川北行署确定的老根据地基本原则与中央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川陕团访问报告中所反映的原川陕边苏区的实际情况，研究、确定了四川省革命老根据地范围，和我们通过调研核实的川北苏区的范围基本相符。

按旧区划，川北苏区计有城口、渠县、南江、巴中、平昌、阆中、通江、苍溪、仪陇、南部、营山、万源、达县、蓬安、宣汉、广元、剑阁、昭化、旺苍 19 县。其中，南江、通江、巴中、旺苍、平昌、苍溪、万源七县，阆中县的大部分和仪陇、广元、宣汉的一半多区乡为巩固的苏区根据地。其他各县苏区均只占部分地区。

川北苏区位于四川东北部大巴山南麓嘉陵江与渠江之间。加上其他部分地区，总面积约 37 567.66 平方公里，人口 410 多万。这一地区大部分为山区及丘陵地，土质较为贫瘠，地多田少，主要出产稻谷、小麦、红苕、苦荞、洋芋。经济作物有油菜、棉花、桐油、药材、木耳等。田多数为小块梯田。除耕田用畜力外，其他劳动全靠人力。妇女全部参加生产，不少妇女还担当主要劳动。

由于地区辽阔，气候各地略有差异。处在大巴山的山地，气

候偏寒，每年有五个月左右山顶积雪不化，夏天需穿夹衣（即棉衣）。较低的平地气候比较适中。夏天温度较高，平均在 34℃左右，冬天最冷时-1~8℃。所产粮食除够本地食用外，部分地区每年尚有外销。山区地下矿藏较丰富，有煤、铁、铜、锡、石棉、盐、石油、天然气等。由于山多平地少，交通运输除沿河居民可以利用水运外，其余地区一律靠肩挑背驮，交通十分不便，以至能够开采的地下矿产也不能迅速外运，外地货物无法及时内销。

由于军阀、官僚、地主长期残酷剥削、统治，山区经济更显落后，山民生活十分艰难，吃的多半是掺和着红苕、菜叶的清汤汤稀饭、包谷羹或洋芋坨坨。穿着更是衣不遮体，不少山民还是夫妻共用一条仅能遮丑的裤裙，谁外出干活谁穿。小孩则终日赤裸着身子跑来跑去；冬天全家挤在低矮黑暗潮湿的茅屋或草棚里，燃烧一个个半干不湿的树疙疸或石炭取暖。嘴脸熏得灰黑灰黑的，加上半饥半饱、缺油少盐造成的干瘦身子和菜色脸，一家家如山中瘦猴。老百姓谁不想吃饱穿暖住得好一点？但就是这样一点起码的做人权利，也被旧社会剥夺得干干净净。正如一首川北民歌唱的：“尖尖山，二陡坪，包谷红苕菜羹羹。弯弯地，密密林，茅草棚棚篾笆门，要想穿伸抖、吃干饭，万不能！万不能！”

为了活命，早在 1928 年前后，就曾经发生过多农民武装起义。1932~1935 年，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发动贫苦农民大搞土地革命，扩大红军。获得土地的农民积极参加各项工作，加入红军，使红四方面军迅速扩大五倍以上。许多优秀青年进入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后，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成为党和人民的优秀干部，另外许多人，则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因此，川北这块称为苏区的地方，也是一个烈属、军属、红干、老红军遍布的地区。

二、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川北社会情况

(一) 土地关系与剥削

川北大量土地都集中在地主和富农手中，广大劳苦农民仅有少量土地，甚至没有土地。仅以巴中、南江、通江等县的土地占有情况为例：

巴中恩阳区旱谷乡乐园社在红军未入川前的土地总面积为 614 亩，6 户地主占耕地 64.25%，1 户富农占耕地 8.56%，25 户自耕农占耕地 27.19%，15 户农民则完全没有土地。这只是具代表性的比较平坦富裕地区。山区如南江大河区北极乡三社，红军未来前，当地共有耕地 271.75 亩，5 户地主有耕地 231.75 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85.28%，3 户小土地出租有耕地 13 亩，1 户自耕农有耕地 7 亩，其他 10 户贫、佃农共有耕地 20 亩，贫、佃农仅占总耕地面积的 7.36%。大河乡五社土地总面积为 233.3 亩，4 户地主有耕地 172.05 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73.75%，3 户富农有耕地 30.75 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13.18%，自耕农 6 户有耕地 25.25 亩，1 户贫农有耕地 2 亩，6 户佃农仅有耕地 3.25 亩，贫、佃农仅占土地总面积的 2.25%。

在通江的永安区，豪绅地主占全区总人口的 7%~8%，土地却占有 70% 左右，其中永安区得汉城（新中国成立后改称红城社），共有土地 1700 多背，邓家大户豪绅占 900 多背，其他地主共占 400 多背，仅地主豪绅即占去土地总面积约 76%。（这里的背，既是川北土语中装东西、驮东西的工具背篋，又是计量单位，以一背篋能装下东西的重量为单位。4 背的重量约为一亩土地的产量，以此类推进行换算。）

总人口 400 多户的通江县广纳区东山乡，赵永定一户地主就

占去全乡土地 40%以上。通江县维新乡阎家湾的地主，则集中了 95%的土地。

从以上举例已经可以看清地富和农民在土地分配上的悬殊。因而地富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十分突出。这种矛盾和对立不仅表现在土地分配关系上，同时还表现在各种各样的剥削形式上。

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不仅体现在剥削的沉重度，而且表现为剥削形式的多种多样。首先看地主对农民的主要剥削形式地租：地租的形式有定额租、不定额租（即分租）等形式。定额租又称干租或铁板租。地主估算他家田地最高产量后，便以此为每年收成标准租佃给农民。佃农每年每季按佃约缴纳地租，并且在佃约上写明：“不管天干水旱，干扬洁净交纳，不得短少升合，两厢情愿，特立此约为据。”所谓分租，就是收获后，地主与农民按议定比例分取收获物。有时半分、四六分（即地主六成，佃客四成）、三七分，甚至有二八分（地主拿八成，佃客得二成）的。在田坎上种的一点杂粮，地主也要收租。如收棉花 100 斤，地主主要收 70 斤；大麦、芝麻、绿豆、黄豆等地主收 2/3。

地主的荒山多，佃户去开发出来，有了收获，地主就要马上加租，如果你不干，就叫你走人。农民要生存，却无地可种，势必要向地主租佃田地，即使明知地租苛重，加租无理，也只得含着眼泪，忍着愤恨过下去。

大地主的管事也八面威风。每年秋收时节，农民都要打酒割肉，请客说租，管事从中盘剥。除地主的正分地租外，管事还要向农民要小押租（约占地租的三成）来盘剥农民。

随着地租而来的另一种剥削形式，叫做“押金”，即佃户向地主租佃田地的“抵押金”，又名“信金”。这种押金也相当重，据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是南充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老红干宋代兴回忆，他们家当时佃地主几亩山地就押了 10 元大洋。

不但押金重，而且由于不断地货币贬值，农民交的押金也往

往跟着贬值，到最后甚至化为乌有。

高利贷，农民称为“血泪钱”。这是地主剥削农民的另一种残酷形式。高利贷分年利息、月利息、场利息。农民急需用钱，地主也要很快收回本利，所以场地和月利的居多。场利有大 1 分至 3 分，即借钱 1 元，一场的时间后就要还本利 1.1 元至 1.3 元；有的 5 分利，即借 10 元，一月或一场就要付利 5 元，连本带息 15 元。还有更高的，巴中县三星乡农民借 1 吊钱，一场还利 900 文，场利就到了 9 分。这是何等骇人的一幕吸血图。另外借谷子的利息一般在 30%~50%。青黄不济时借 1 斗，收割后连本带利还 1 斗 5 升甚至 2 斗，利息已是很重了，农民还要请他们抽大烟、喝酒、吃肉才借得到。

苛捐杂税，当时川北地区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据统计不下七八十种。最著名的有烟捐。军阀、地主为了多抽烟捐，强迫农民普遍种植鸦片。初种下抽窝捐，长好后抽苗捐，不种的则抽懒捐。有时伪称戒烟还要抽铲烟捐。最穷苦的农民每年都要缴纳两次，每次一二十元大洋（有的地方，烟捐从 1930 年预收到 1934 年）。由于田地普种鸦片，严重影响粮食生产，加之不吸烟也要被强行缴纳所谓的“禁烟捐”，致使很大一部分农民在种鸦片的同时，也染上了大烟瘾。农民生活更显恶化。

粮税，又叫田赋税，是军阀、官僚的主要收入。从调查看，粮税每年都要征收三四次、十余次不等。杨森预征到他被人民解放军打垮，新中国成立 6 年后的 1955 年；南充开征到 1961 年，田颂尧预征到 1967 年。而在江油县，这个地方居然预征农民粮税到新中国成立 35 年后的 1985 年。

至于随粮附加款就更重了，有时甚至超过 10 余倍。比如南充，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两年中粮税总额 2.4 万元，附加款项则到了 16 万元，再加上地方公共附加税统计 40 余万元。田颂尧在苍溪所征正规经常税目 48 种，有的叫不出名目来。刘存厚统治区苛捐

杂税 32 种。据达县县志载：“民国 13 年冬（即 1924 年），刘存厚在达县自称川陕边防军督办，占达县、宣汉、城口、万源四县，二十一二年间，除正常消耗外，附收光洋 2 131 000 元，属于军用者 1 375 000 元，属于地方局费用及糜耗者 756 000 元。”总之，在他们所在的防区内，关卡林立，随意征收。所有这些苛捐杂税，都必须通过地方团总、保甲长去征收，于是这些大小官吏又在收捐时随意附加大洋若干元。

此外还有什么驻防费每家每次大洋 1~2 元。如遇军阀内战，驻防军阀战败撤退时更是持枪挨门挨户尽情勒索。前门走虎，后门进狼，新军阀“换防”，不数日驻防军款又派下来了。

壮丁费，这也是地主土豪对农民凶暴的剥削手段之一，他们把农民的儿子拉去当兵，为军阀打内战当炮灰，如果要取人回来，就要大洋几十元乃至上百元。农民因此倾家荡产甚多。

除上述剥削外，更有所谓“坟粮”，穷人死后无属于自己的土地下葬，埋在地主的荒坡地上，每年须向地主交大洋角，埋的坟多了，地主便变着花样涨价，从 1 元到几元不等。

此外，还有一种无中生有的“榜粮捐”，即农民必须代替地主缴出额纳粮。所谓“出额纳粮”，即在所谓的特殊情况下，超出军阀和他们扶持的地方政府规定的数量及范围的费用和以粮抵钱，以钱抵粮，以劳代钱、代粮。当然，地主是不会放过这种打着“上峰差遣”旗号，附加要农民每年无偿为他们服几十天力役，为他们种地、抬滑竿，或在红白喜事时帮忙干活、送礼，逢年过节给他们送粮和农民自己不敢吃的肉、鸡、鸭，各种小菜新出来，首先送他们尝新的剥削机会的。

军阀及其附庸政府逼捐税的手段也骇人听闻。一个农民欠缴一块大洋的捐款，保甲长便把他抓去打一百板子屁股，按此比例，多欠多打。打完后，欠捐仍照数缴清。如在指定时间内再缴不清，农民就得坐牢挨吊打，家里的猪羊鸡鸭或农具、家具等也要被抢

去抵押。这里的保甲长职位多系用金钱买来，专门以收缴捐税为生，有任意抓人打人的特权。如果保甲长不能向军阀缴足捐款，军阀就派军队下乡追缴，不用说，那会弄得鸡犬不宁，老百姓还得分担一份庞大的军队招待费。

繁重且花样百出、手段恶毒的剥削，像一条多头毒蛇，死死地缠在川北农民身上，无时无尽地吸取他们的血肉，激起并不断加深着广大农民的仇恨。正如当时巴中县的一首民谣所说：“说声派杂税，团总派，保甲长派，地主附带派，胡派、滥派、指名官派，硬起心肠由你派；讲到收洋钱，场上收，乡下收，明收、暗收，不把手收，只怕天收，谨防尸骨无人收。”老百姓真是到了满肚子苦水没处倒，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步了。

（二）军阀割据形势与军阀、官僚、地主对人民的压迫

红军入川前，川北地区为几个军阀所割据。据1932年档案资料记载，当时在川北盘踞最广的是军阀田颂尧，据计有巴中、通江、南江、阆中、苍溪、南部、剑阁、昭化、广元、江油、梓潼、三台、中江、蓬溪、绵竹、安县、什邡、射洪、西充、盐亭等20余县。其次是军阀刘存厚。刘存厚计盘踞达县、宣汉、城口、万源四县。其他邻近川北地区并强行割据广安、岳池、营山、武胜、渠县一带的杨森；割据开县、开江、梁山（梁平县）、大竹一带的刘湘；盘踞一些县部分地区的李家钰、罗泽洲等，大大小小的军阀，就像贪婪的蛔虫，盘踞在川北人民的肠道里，吸取着他们仅有的一点养料。

由于军阀混战连年不断，到处拉夫抓丁替他们运军火、打仗、争地盘、送死，青壮年不敢出工，不敢赶场，甚至夜里都不敢留宿家中。军阀的走狗保甲长、团丁到各家捉拿追赶，一日数惊。一些青壮年宁愿将自己的手足弄残也不当兵。青年妇女不敢出头露面，一天到晚也是东躲西藏，怕遭到地痞和丘八们的侮辱。在

军阀、地主的压迫下，不知长夜何时是尽头。在保甲制度的黑暗统治下，县区保甲是军阀、地主在基层统治人民的工具，他们有权对人民任意处置，甚至枪杀。有的军阀认为杀人就如同杀几只鸡一样便宜。因为当时是混战之际，借任何一个事故就可以摆几十个人头。有的地主家庭公然私设法堂，吊打佃农和雇工。甚至利用一些封建迷信玩意来麻痹和转移人民斗争的意志（如组织“神兵”等），以巩固其政治统治地位。

镇压各地人民罪恶累累。早在 1925 年，军阀田颂尧便配合地主武装镇压了苍溪县温全武的起义（见苍溪地方志，略）。1932 年又镇压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士文同志等领导的南部县升钟暴动（见南部县地方志，略）。1931 年军阀刘湘对李光华、王维舟等同志在梁山（梁平县）成立的游击纵队进行围攻，李光华同志遭陈兰廷杀害。1931 年伪保卫团镇压苍溪中学学生运动。1932 年伪军警镇压南江中学学生游行示威运动，并逮捕学生领袖数人等。这些无不说明军阀、地主残暴成性。川北地区在军阀、官僚、地主的统治下，已无异于一座人间地狱。

（三）农业生产衰退，民不聊生与人民的反抗斗争

由于军阀、地主对川北人民经济上巧取豪夺，政治上血腥统治，致使川北地区农业生产衰退，民穷财尽，人民被迫起来反抗。

1. 农业生产衰退。军阀和地主对山区人民的残酷统治与压榨，使得农民没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挣扎在死亡线上。由于生产水平低，一般用人力耕作，妇女亦多从事耕种，山区多广种薄收，甚至刀耕火种。如田耕一遍就栽谷子，除一次草不追肥等收割；红苕不拢箱，小麦、棉花多采用无肥撒种；开生荒、烧山、刨浅窝下种等收获，第二年又换一个地方耕种等等。80%的田地只收种一季，20%的收种两季。棉花一窝留三苗，高一尺多点，一窝只结两三个桃，有的一窝一个不结。当时的产

量，从巴中县恩阳区旱谷乡禾园社的调查看，水稻 280 斤/亩，麦子 130 斤/亩，棉花 150 斤/亩。南江大河区大河乡五社水稻 280 斤/亩，麦子 130 斤，红苕 600 斤，洋芋 1000 斤。这是一些比较富裕的地区。有些地区平均亩产 80 斤，最好的（富农自耕地）产 120 斤左右，最低的仅五六十斤。产量如此低，除上述生产水平低外，主要原因还是军阀、地主的残酷压榨，造成农民终年勤劳却食不得饱，衣不蔽寒，生产情绪低落。“三月不犁板，扯了谷椿栽现眼。”这是富裕一点地区农民对生产不感兴趣的典型表现，其余地区可想而知。加之拉夫和抓壮丁，青壮年农民在拉夫和抓壮丁紧张之际，不敢出工，有的逃入深山，有的还逃亡他乡，直接影响和摧残了生产力。连年的军阀混战造成本来就地广人稀的川北丘陵山区更加劳力贫乏。其他如缺肥少种，耕牛、农具缺乏，凡此种种，最终导致川北地区田园荒芜，百业凋零。

2. 民不聊生。农业生产衰退，农民胼手胝足，少许收获也都被军阀、地主搜刮。农民尽管心有不甘，也不得不陪着小心，自己把用血汗浇灌出来的粮食给地主送上门去，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农民生活极其贫困，据南江县大河区大河乡五社典型调查，一般家庭一年都要差半年的粮，只有靠小菜、糠、野菜充饥。每人每年平均有一斤腊肉，有的连过年也没得肉吃。人均一年约有 8 两油，5 斤盐。每人平均两年一套单衣，30% 没棉衣穿，有的也是穿了几辈人的千疮衣。95% 的贫农住草房，有的住在岩洞中。

又据巴中县恩阳区旱谷乡乐园社典型调查，红军未去前农民一年中有 3 个月吃米，5 个月吃杂粮，其余 4 个月靠小菜、野菜、野草充饥。每人每年油 1 斤，盐 2 斤，肉 3 斤，衣服每人两年一件。以上是川北富裕地区的情况。更多地方的资料告诉我们，农民们住的多系草房、窝棚和山岩洞。有的根本没有地方住，只得晚间钻进堆放在地边的包谷壳里睡觉，川北人当时称之为“冲壳子”。有的晚间烧起野草在旁边取暖睡觉，冬天烤起火斑，起了

疤，川北人称之为“睡烤觉”。川北当时流传着这样的俗语：“坐在陡山边，吸的坨坨烟，吃的洋芋果，穿的没裆襟襟片。”

红军未到南江前，黄谷由 2400 文 1 斗（平均每升米 500 文）上涨到 4 串（4000 文），甚至 1 块银元 1 升（1 块银元折合 24~32 串），也就是说，在地主豪绅把持下上涨了 50~60 倍。这样的米价，农民还能吃得到吗？通江广纳区东山乡农民赵永礼，全家 9 口人只有两背土的菜园地，还是他爷爷做工买的。5 个小孩没穿的，冬天缩在烂被盖里，找柴烤火，满身火癍子，他 4 个大人，每年放下镰刀就背包谷，吃野菜、松花面（松树花晒干打成的粉末）、神仙面（观音土即白泥巴）充饥，最后还不得不把儿女带到上河换包谷。南江北桠乡有个董大爷（他活着时孤身一人，人们不知其名，都这样称呼他），原来种田，劳力强，技术好，群众讲：“他使个眼力，就当干 3 天活路。”他租地主董大学 40 背田来种，纳租后没吃的，借了老板的钱，结果收获的粮还不够还利（借钱时讲好以粮折钱，借 1 石，利 5 斗），弄得去讨口并最终饿死。

每年二三月是最困难的月份，卖青苗给地主的农民往往占到 40%。当时穷人中流行有两句话：“莫吃的天气长，莫盖的晚上长。”一般人家吃米只够三个月，贫、雇农则很少有米吃，其他靠杂粮（高粱、大麦、豌豆、胡豆等），半年靠野菜、野果、树叶树皮、芭蕉头等。妇女们的生活更苦，她们没鞋穿用棕包脚，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裤子穿，巴中白宗秀说：“她因为家穷得不能生活，送去当童养媳，头上虱子成堆，晚间睡在草堆里。这还是比较平稳的年岁，一遇灾荒年就更苦了。”据通江广纳区东山乡调查，甲子乙丑年（1924~1925 年）闹大饥荒，死人过半。地主放粮把石灰混在里面，吃了肚子胀就不能再吃了。生谷到手马上就生吃了。贫农张兴俊甲子年四个儿子卖了三个换包谷。杜正春有两儿三女，饿死了两个，勒死了两个，只救大人不救小孩。杜

正卓，一个连蚂蚁都怕踩死的人，在走投无路中把仅有一只鸡子肚内装上超量的鸦片，吃后一家死得只剩两人。天生寺 48 户人，最后死得只剩 8 户。更加惨不忍睹的是，通江烟溪乡农民杨家连家，甲子大饥荒年实在饿糊涂了，竟然吃自己的小孩，杨家连死后，老婆又吃他，几天下来全家死得精光。

“军阀梳子梳，豪绅篦子篦，甲长牌头刀剃，收款委员来剥皮。”这首在川北广泛流传的民谣，道出了当时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真相。无穷无尽的军阀混战，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加上天灾，已经把川北地区人民推入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贩卖鸦片烟一直是四川军阀的生财之道，川北山区，特别是巴中一带又适宜种鸦片。田颂尧等军阀命令农民将大片良田变为烟田，以供其盘剥和挥霍，川北又成了兵匪为患，烟毒遍地，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对此，成都的一份报刊也直言不讳：“政治的腐败登峰造极，军官的蛮横亦是不可多见的。一方面要扩充军队，购买装备，另一方面要堆积财富，在此两种欲望之下，便只有尽其剥削人民的能事，设立种种的苛捐杂税，田赋一年征收 10 年、20 年都是极平常的，于是人民生产力经营力低落了，农村开始崩溃，军人还是安然地剥索，于是农民逃荒，土地荒芜。这样一个背景，便正是共产党蔓延滋生的佳地。”（1932 年《复兴月刊》^[1]）

3. 人民的反抗斗争。军阀、官僚、地主在川北地区不仅变着花样任意榨取老百姓的血汗，其吸血手段也是十分残忍的。如当时有一种叫十元半开款，即每家每年至少出款十元半。后来每家竟增加到两三项，收款委员、保正、排首成天追逼，动辄打板子、关监、吊打抄家，已经哭声遍野了，反动政府更是火上浇油，还要出一张“杀人可恕，欠款难容”的告示——这就是说，没有款缴，就要拿人头去。人民的怒火终于被反动派点燃，他们从绝望到求生存，从一家一户到几家、几十家，成百上千家地团结起来